

# 清代台北芦洲的土地赋税关系

陈支平

**内容提要:**台湾是中国的晚开发地区,清代前期,台湾各地特别是台北淡水河流域的土地赋税关系大多处于无政府状态,民间土地开垦与政府赋税征收的相互脱节现象相当普遍。清代中期以来,政府虽然采取许多措施,试图加强对于民间土地开发与赋税征收的控制,但是始终难于达到预期的效果。民间在土地开发、交易和登籍纳税等方面所采用的家族行为,在清代台湾土地赋税关系中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清代 台北芦洲 土地赋税

台湾是中国的晚开发地区,清代前期,台湾各地的土地赋税关系大多处于无政府状态。民间土地开垦与政府赋税征收的相互脱节现象相当普遍。台北淡水河流域的开垦又比台湾南部的开发更迟了许多,政府对于民间土地的土地赋税管理更加滞后。自雍正、乾隆年间地方政府在这一带设庄征课以来,民间的实际耕地面积与政府的土地登记和课税数额始终存在着很大的差距。2000年春,我在台北芦洲地区(旧亦称和尚洲)从事社会调查,获读一批清代中后期的民间契约文书。通过这些契约文书,或可对清代后期台湾北部的土地赋税关系作一典型的个案分析。

—

台北芦洲位于淡水河的南岸(旧亦属淡水厅、淡水县管辖)。台北淡水河流域由于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所谓“山愈深,土愈燥,烟瘴娱厉,人民鲜至。”地方的开垦十分艰难,村落乡族的繁衍也险阻重重。故当时有些地方官员甚至认为作为边远地区的台湾,从情理上说也不应当对土地课以严格的赋税,台北地区土地关系之复杂及其田赋租税的混淆不清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雍正年间,地方官员尹秦曾在《台湾田粮利弊疏》中这样说道:

窃查台湾全郡,尽属沙壤,地气长升不降。所有平原,总名草地。有力之家,视其势高而近溪涧淡水者,赴县呈明四至,请给垦单,召佃开垦。其所开田园,总以甲计,每田一甲,约抵内地之田十一亩有零。郑氏当日,分上、中、下三则取租。开台之后,地方有司即照租征粮,而业户以租交粮,致无余粒,势不得不将成熟之田园,以多报少,欺隐之田,竟倍于报垦之数。臣等细访,向来任其欺隐不行清查之故,则其说有五:现征科则,计亩分算,数倍于内地之粮额,若非以多报少不能完纳正供,此其说一也。台湾少地,每岁夏秋大雨,山水奔泻,田园冲为涧壑,而流沙壅积,熟田亦变芜壤,

若非以多报少,将何补苴亏缺,此其说二也。台地依山沿海,所有田园,并无堤岸保障,海风稍大,咸水涌入,田园卤浸,必俟数年咸味尽去之后,方可耕种,若非以多报少,何以抵纳官粮,此其说三也。台郡土脉炎热,不宜用肥,两三年后,力薄寡收,便须荒弃两年,然后耕种,若非以多报少,焉能转换办公,此其说四也。佃丁系漳、泉、潮、惠客民,因贫地宽,可以私垦,故冒险渡台,设使按亩清查,以租作粮,伊等力不能支,势必各回原籍,以致田园荒废,额赋虚悬,此其说五也。夫田粮之欺隐若此,其所以致此欺隐而难以清厘者又若此,宜作何变通,以除欺隐之弊?海疆至大,与内地不同,臣等愚昧,不敢轻议,谨据实奏请圣裁。

不用说尹秦对于台湾这种欺隐田地、赋税不清的现象束手无策,即使是这一奏疏上报于雍正皇帝,最后的结果也是不了了之。台湾民间开垦的土地日益增多,而私下隐瞒不纳税的土地也随之日益增多。《诸罗县志》、《淡水厅志》的作者甚至把这种民间隐瞒田产的行为说成是固海疆捍外围的保障之一,该县志云:

台赋甚重,民不觉其病者,新垦田肥,载长补短,虽输赋加倍,地力有余。此在国家为漏卮,在小民为遗利,不可以此登版籍,宜施法外之仁。无论圣漠宏远,不屑屑岛屿刀锥,而此邦土民非有蝇头之利,孰肯远隔重洋,安土重迁,处于天尽海飞之地哉?且朝廷宿兵,岁靡饷至,岂有求增赋而尽地利之心?其要在抚绥安辑,固海疆外围,为闽、粤、江、浙之屏蔽,台郡安而四省安也。

清代台湾地方官府对于民间开垦土地和升科纳赋既然抱有这样的态度,那么民间大量隐瞒田产和赋税也就不能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再加上台湾开发之初的认垦制度,以及民间土地买卖和地权转移现象的频繁发生,土地业权主人分化为大租主、小租主等多层的角色,所谓“台地新垦田园未毕升科,……业户是报垦时出首,征收代纳不及十之二、三,官无从稽核。……内地惟正之供,就田征赋,悉由田主交纳,包粮者有禁;而淡水田主所收者谓之小租,官所征者谓之大租。大租概由业户征收转以纳官,所收浮于所纳,每田各带大租若干。业户自有契据,可以典卖,实与内地包收包纳同。”这样就使得民间实际耕种的土地,与官府每年所据以征收赋税的土地,几乎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地方官府只要能够收到原来册籍上所登载的赋税额,对于新开垦土地的登记升科并不十分关心。从《淡水厅志 赋役志》中可以看出,这里的田园旧额是五百二十九顷余(按:旧额是指雍正年间及乾隆前期的田园额),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报垦新升科的田园约三百顷,合计旧额、新升,淡水厅在册田园为八百三十一顷余。而从乾隆四十三年至同治年间编修厅志时的一百年时间里,新登记升科在册的田园仅有二十顷又一十甲零。众所周知,淡水地区移民和开垦的高潮期是乾隆年间之后的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各朝(1796-1874年),在这个开发高潮期里所开垦出来的土地,其数量一定大大超过雍正、乾隆年间的开垦土地数量。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反映在地方官府的田地赋税册籍中,嘉庆至同治年间所开垦的土地,虽然不能说全部被隐匿下来,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未能登册纳赋,却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当然,地方官府从增加财政收入和维持社会公平安定的角度出发,还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地落实民间的土地和赋税,使拥有大量田产的业主多承担一部分租税,同时也使一部分穷苦的佃耕农户能够获得耕种土地的权利。因此自清代中期雍正年间开始地方官府就试图在台湾推行某种程度的“按田问赋”,并且把台湾特殊的土地面积计量方法即以甲计数改为与清代各地通

行的以亩计数的计量方法统一起来。《淡水厅志》记云：

台湾田赋与中土异，自荷兰令中土遗民受种，以十亩为一甲，分上、中、下则征谷，……伪郑取之，改为官田，耕者为官佃，输租乃旧。……洎归命后，悉为民业，故不以亩计，仍以甲计。按内地制，六尺为弓，积二百四十弓为一亩，……台田一甲，当内地十一亩三分零。……赋法凡田一甲，上则征银（谷）八石八斗，中则七石四斗，下则五石五斗；园一甲，上则征谷五石，中则四石四斗。淡水田园康熙五十三年始报升科，照彰化县旧例。雍正十年奉旨：自九年始照（福建）同安例，田园均化甲为亩，以一亩作十一亩。其田照同安民谷例征收，上田亩征银八分五厘三毫四丝，秋米六合九抄五撮；中田亩六分五厘八毫八丝四忽，秋米三合八抄七撮；下田亩五分七厘五毫五丝，秋米免。其园照同安盐米不征盐，折例征收，上园视中田，中园视下田，下园亩征银五分六厘一毫八丝，米亦免。凡银三钱六分，折征谷一石；凡秋米一石，征谷二石。计上田每甲应征谷二石七斗四升有前奇，中田每甲二石八升有奇，下田每甲一石七斗五升有奇；上园视中田，中园视下田，下园每甲应征谷一石七斗五升有奇。

虽然说官府希望把台湾的土地计量方法与内地通行的计量方法等同起来，以便落实土地和赋税册籍，但是其实行的效果并不理想，民间在进行土地物产等交易时，基本上还是我行我素，照样以甲计算，所以政府在许多场合也无可奈何，甚至听之任之。以至地方官员在编修地方志时，在同一本方志的同一卷目中，也无法把这种计量方法统一起来。同治年间编修的《淡水厅志 赋役志》中，既有田园若干顷若干亩若干分、厘等等的记载，又有若干甲若干分若干厘、毫、丝、忽等等的记载。这种混乱的记述方式，本身就有力地说明了从雍正年间以来台湾地方官府试图进行土地、赋税的清理和落实，效果是不理想的。

## 二

光绪年间，福建巡抚兼台湾防务大臣刘铭传到台湾，除了奏请台湾建省和落实许多防务措施之外，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开始在台湾着手清理土地和租赋，在省、府、县设立了“清赋局”，清丈土地，希望在台湾真正做到“就田问赋”和“就户问赋”。刘铭传的清田问赋，实际上是在某些程度上沿袭了雍正九年的“化甲为亩”的办法，光绪十三年（1887年）刘铭传曾为清赋事告示全台民众略云：

照得全台田亩，前经出示，奏明清丈，已据各县陆续报丈清楚。查台湾自隶版图以来，田园未经切实丈量，供赋轻重南北悬殊。……自道光初年之后，续垦田园相率欺隐，又有番租、隘租各项名目，影射吞匿，均未报升。此次清丈竣事，额溢数倍，若仍照旧章开征，轻重不一，小民苦累不堪，自非通筹全局，别议赋则不可。已将现丈田园，无论新旧，悉照同安下沙成例，分别等则，化甲为亩，以一甲作为十一亩，仿一条鞭办法，删去各项名目，凡地丁粮米耗羨等款，一并在内，并化折征谷价，提充正赋。本爵部院系照台属各县最轻之赋，有减无增。此外沿山各处及垦荒未熟田园，暂予剔归未入额，从缓升科，分别完纳正耗。……为此，示仰阖属业户人等一体知悉：尔等须知朝廷恩膏下逮，务当踊跃输将，自此次定钱粮科则，并随收补水平余，以后作为永远定额完纳正供。

刘铭传的这次清赋运动,可谓雷厉风行,后代学者对于刘铭传的这一清赋运动也颇为肯定,认为效果显著。但若以和尚洲的情景而论,则其效果仍然是不容乐观。虽然也经过清丈、验契、颁发丈单、印照等一系列手续,但从现存的民间契约文书看,仅就“化甲为亩”这一点,就完全没有做到。请看下面的由李氏家族李长利记承买的二纸土地交易文书:

(一)

全立杜卖尽根田契字人李建智全侄西日等,有承父明买王金广水田一所, 数不计,内带水窟一口,址在和尚洲田仔尾庄。东至林家田,西至陈家田,南至林姓圣母竹围,北至 沟底,四至明白,经爵抚部院刘丈明下则田肆分肆厘伍毫捌丝零捌微,年配纳隆恩租谷壹斗伍升正。今因乏银别创,愿将此水田尽行出卖,托中招引族亲李长利出首承买,三面议定依时值尽根价银纹银库它壹佰柒拾贰两伍钱正。银即日全中交智全侄等亲收足讫,田随即踏明界址交付长利前去起耕掌管收租纳课永为己业,不敢异言阻挡。自此一卖千休,永断葛藤,四至之内并无存留寸土。窃此业系是建智同侄等承父明买物业,与别房人等无干,并无重张典借他人以及来历不明,如有等情,智等出首抵挡,不干买主之事。此系两愿,各无反悔,口恐无凭,笔乃有据,立杜卖尽根田契字壹纸带买契壹纸丈单壹纸等叁纸付执为 。

即日全中亲收过尽根契内佛银壹佰柒拾贰两伍钱完足 。

代书人 陈滨津

为中人 族弟金

在场知见人弟妇陈氏

光緒十五年十一月 日 全立杜卖尽根田契字人李建智 胞侄西日

(二)

立起耕典园田契字人李仙评,有承先祖父闾书内公业田园数段, 数不计,址在和尚洲,或在大旗尾庄,或在南港庄前后。田丈明下下则一甲一分七厘三毫八丝一忽六微,园丈明下则三甲四分七厘三毫七丝四忽六微,东西四至载明丈册内,年纳隆恩租谷六石七斗二升正。仙评十二份应得一份。今因乏银别置,愿将此十二份一份公业田园尽行出典。先问房内至亲人等不欲承受外,托中招引李长利出首承典,全中三面议定典价银一百四十六大圆正。银即日全中交仙评收讫,田园随即踏明界址交付李长利前去起耕收税纳课不敢异言阻挡。其田园限典二翻,每逢丑年巳年与胞叔对半均收,限满之日,当于八月半前先送定银为准,余候冬至前备足契面银赎回原字,各不得刁难。保此田园系是仙评承祖父闾书内公业十二份应得一份,与别房人等无干,亦无重张典挂他人及来历交加不明为碍,如有不明,仙评出首抵挡,不干典主之事。此系两愿,各无反悔,口恐无凭,笔乃有据,即立起耕典契字一纸付执为 。

即日全中亲收过典契字内佛银壹佰肆拾陆大圆完足 。

批明契券丈单系是长、次房收存声明 。

批明此数段田园系是仙评顶四房轮流公业 公 李长利耕作有 地银并借项在内,经立字为凭,仙评应份得磳地银并借项壹拾肆元正,总立在典契字内,异日取赎之时不得糊涂照。

批明光绪拾玖年冬至前仙评再向长利记借银叁拾元,每年贴息银肆元,不得推诿再。

为中并代书人堂侄尚生  
在场知见人 男琼瑞

光緒拾捌年壬辰十一月 日 立起耕典园田契字人李仙评

上引这两张契约,第一张订立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第二张订立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均在刘铭传实行清赋后不久订立的。契约中明白写着所卖之田“经爵抚部院刘丈明下则田肆分肆厘伍毫捌丝零捌微”和“丈明下下则壹甲壹分柒厘叁毫捌丝壹忽陆微”等,表明虽经过刘巡抚的丈量清赋,但这里的土地计量方法依然如故,并没有“化甲为亩”。

如果说上引的契约文书是属于私家文献的话,那么光绪十四年(1888年)颁发给业主的丈单,应当是货真价实的官府文件。然而在这些文件中,同样明白记载清丈之后的田园,还是以甲计数,兹引和尚洲业主陈石和王貶的两张丈单为证:

(一)

丈 单

淡字第壹佰零玖号合同

台湾布政使司为掣给丈单事。照得全台田园奉爵抚部院刘

奏明清丈陞科,今淡水县丈报习字第十、十一、十三、十四号业田番,田主陈石,坐落里芝兰二堡和尚洲庄,下则田园壹甲贰分壹厘壹毫五丝八微,至并赋则由县编造图册外,合行掣给丈单永远管业,嗣后倘有典卖,将丈单随契流交推收过割。须单

右给 县 主陈石 收执。

光緒十三年十二月 日给

台湾布政使司

淡字第壹佰零玖号

遵奉奏明随收清丈经费番银壹圆捌角壹办陆尖六周二末。

(二)

丈 单

淡字第陆千贰佰拾肆号合同

台湾布政使司为掣给丈单事。照得全台田园奉爵抚部院刘,同治四年杨绥未卖奏明清丈陞科,今淡水县丈报福字第十五号业田番,田主王貶,册名偏,坐落里芝兰二堡河上洲庄,中则田园甲贰分陆厘肆毫陆丝贰忽肆微,赋则由县编造图册外,合行掣给丈单永远管业,嗣后倘有典卖,应将丈单随契流 过割。须单

右给 县 主王貶收执。

光緒拾肆年六月 日给

台湾布政使司 字第 号

遵奉奏明随收清丈经费番银 元叁角玖办陆尖玖周叁末陆皮。

以上官府颁发的丈单,是淡水县奉命清丈后颁发的第一次丈单,完全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和

尚洲田地清丈的实际情景。在这些丈单中不仅依然载明该田园若干甲若干分若干厘之外,而且其中的“甲”、“分”、“厘”等,是由县府统一印制的样式,至于若干甲若干分若干厘等等实数,才是根据各业主落实的情况,临时填写上去的。这也就是说,和尚洲在这次清丈中未能实行刘铭传“化甲为亩”的原旨,并不是和尚洲一地的临时性措施,而至少是淡水县在即将进行清丈问赋时就已经决定的,否则就不可能印制如此明确而统一的“丈单”样纸,分发到各处以便填写发给。

### 三

从整体情景而言,光绪年间刘铭传的清田问赋运动,也同自雍正年间的历次清赋一样,在淡水县和尚洲一带的执行情况并不很理想。历届官府对于和尚洲田地的征赋,只能掌握一个不失“原额”的大体数字,而这个大体数字与民间的实际耕作面积有较大的差距。而从民间这方面来说,每年只要交纳了官府所认可的“大体数字”的租赋之外,土地的私下交易与租赋的转移过割以及继承等等,又自有其一套民间习惯法所依循,这种民间所约定俗成的习惯法与官府的清田问赋是无法同一而言的。比如民间在交易田产时,该田产所附带的官府租赋的多寡,是这块田产评估价钱时的重要依据之一,政府租赋承担比较重,这块田产的价钱可能就低贱一些;而政府租赋承担较轻或者没有附带政府租赋,那么这块田产的价钱就会相对高一些。某一块田地经过多次交易之后,辗转多主,田产与业主、耕作者以及与原有的租赋相互脱离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再如民间的分家析产,该业户原来承担的租赋,也都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而随意分割处理,并无需报诸官府入案登册。下面所引用的二纸和尚洲居民的分家文书,其中就有这样的内容:

#### (一)

立嘱书字人李邪,窃谓孝弟忠信足颂于千古,父言母训宜遵乎万年。邪前妻洪氏生有两子,长机,次汉,俱已传孙,不幸次男早逝。后妻黄氏生有五子:曰兴、童年去世,曰怡、曰湖,渐已长成;曰祥、曰树,尚在幼稚。今邪愁病日臻,欲效九世之谊,恐蹈阅墙之讥,念兹在兹,析居分爨,定规垂训,方敦和睦于万世。邀请房亲耆德公仝场议,抽出存公长孙养老外,余田园厝宅家器财物概作七房均分,祝告祖先拈阄为定,各宜凛尊严训,方得我心之所同。并自今以始,尔等遇迹自身予一人以宁,倘滋生事端,许房亲公人绳愆纠谬,指斥其非。所有应份物业,开列于后,今欲有凭,立嘱书一式七纸,各执一纸永为存。

- 一批明长房忠字,拈得头前园从南起首段。
- 一批明贰房孝字,拈得头前园从南起贰段。
- 一批明三房仁字,拈得头前园从南起三段。
- 一批明四房义字,拈得头前园从南起四段。
- 一批明五房礼字,拈得头前园从南起尾段。
- 一批明六房智字,拈得竹围内园头前田俱南势。
- 一批明七房信字,拈得竹围内园头前田俱北势。

一批明观音山茅埔带山一所,年税银九元,竖寮尾田一所,与阩叔存公值年,依旧存公做七房轮流。

一批明竖寮园一段,年税银九元,为长孙自掌一批明大尾田一段,年租四石,为邪养老终生,与三、四、五、六、七均分,长、二房不得追求。

代笔人林载清

功侄吉、瓶

场见人功兄钳、三鸾

咸丰十一年桂月 日 立嘱书人李邪

长男机、二房孙益、三房孙用、  
四男怡、五房湖、六男祥、七男树

## (二)

全立合约字人李邦畿、乾再、五湖、银汉、怡回、应祥、树林全承祖父阩书应份分得园及田数段及厝宅家器什物等项,登载在上手嘱书内明白,又踏出长孙业,亦登在上手嘱书内明白。先前田园数段典过房亲抵还债项,恐后代子孙找赎生端,畿兄弟承长房次贰房全请房亲在场公议,长次贰房就此典业对半均分,畿兄弟分得鸭母堀园东畔壹段,又分得竹围后田壹段,又分得大埕园北畔壹半,即日就房亲再议,七房兄弟定界均分,后来子孙不可争长夺短,竹围后田的税银捌元肆角,鸭母堀园的税银十五元,大埕园的税银陆元,共园田的税银贰拾玖元肆角,每房分得税银肆元贰角。将此田园踏截,凭拈阩为定。口恐无凭,即全立合约字七纸壹样,各房各执壹纸付执存。

一批明长房系愿分得竹围后田南畔壹截的税银肆元贰角。

一批明次房系愿分得竹围后田北畔壹截的税银肆元贰角。

一批明三房系愿分得鸭母堀园东畔首截壹段的税银叁元,又大埕园东畔首截壹段的税银壹元贰角。

一批明四房系愿分得鸭母堀园东畔次截壹段的税银叁元,又大埕园东畔次截壹段的税银壹元贰角。

一批明五房系愿分得鸭母堀园东畔第三截的税银叁元,又大埕园东畔第三截的税银壹元贰角。

一批明六房系愿分得鸭母堀园东畔第四截的税银叁元,又大埕园东畔第四截的税银壹元贰角。

一批明七房系愿分得鸭母堀园尾截的税银叁元,又大埕园尾截的税银壹元贰角。

代笔人 水 夫

知见人伯叔三喜、钳夫、瓶夫

同治叁年拾壹月 日 全立合约字人李邦畿、乾再、五湖、应祥、树林

在上引的第一张分家嘱书中,原业主李邪除了把各种田地房厝物产等尽可能公平地分析给七房儿子之外,还把该户对官府所承担的租税,也作了处理。其中七房儿子所分得的田、园均未负担租税,应属于未登入官府册籍的土地。而只有观音山茅埔带山一所,承担有税银九

元。这块茅埔并不是李邪所有的全部财产,而是与其兄弟共有之物,其兄弟去世后,由李邪与侄儿阍所共有并轮流掌管。其税银的交纳也由值轮掌管者负责。而现在李邪把这份产业分析给自己的七房儿子,这块仅有一半产业的茅埔,也同样留为公业而由七房儿子轮流值掌,其茅埔的值轮税银,再由这七房子孙值轮交纳。这样一来,这块茅埔原先在官府册籍中的登记业主,经过如此多层轮值之后,早已失去其原来的面目,从而使官府对于税银的掌控显得更加艰难。

李邪的另一块负有税银的土地是坐落在竖寮的园产,年纳税银也是九元。这块园产是属于七房儿子分析之外的所谓“长孙田”。长孙是该家族得以延续发展的标志,所以在福建、台湾民间的分家析产过程中,往往都要抽出一定份额的田产作为“长孙田”,以示珍重。原业主李邪在分家时特地把这块有税银的竖寮园留给长孙,并由长孙继承其纳税的责任,这当然也包含有在官府册籍中当家立户的意味。清代的闽台农村社会,虽然一般的民众尽可能地隐匿土地财产,规避对官府所承担的纳税义务,但是完全在政府的册籍中消失,游离在“编户齐民”之外,也是一般的家族和家庭所不愿意的,因为那样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在基层社会所应有持得的合法地位。而长孙将是家族中的未来辈份中地位最高的继承人,长孙以某种名义在政府的册籍中“当家立户”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这“当家立户”的长孙不一定用自己的真名实姓去与官府发生关系,而往往象芦州著名的田野美李氏家族那样,另起一个“李长利”等等的名号,来与官府发生联系。

在上引第二纸分家合约书中,其分析得产的儿子也是七房,所不同的是这七房儿子的分析得产是经过两次而完成的。第一次由其父母辈立下分家嘱书,经过若干年之后,其父母已经去世,上次分家嘱书中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由这七房儿子邀请族长公亲们前来协议公断,再次立下分家合约文书。而在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当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税银的重新分配。当其父母在世时,这个李氏家族共承担有官府的税银二十九元四角,每房刚好摊得四元二角。因此,不管这些兄弟所分的田地坐落何处、面积肥瘠如何、是否在官府的册籍中登录等等,一概平均摊派继承。通过这样的分家析产之后,原有的税银虽然被继承了下来,但是这已经与原来所谓的“就田问赋”和“就户问赋”意义上的赋税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时的赋税分析,犹如有些家族在分析时把所欠的债务也平均分配给儿子们继承一样,只是一种应纳的数字而已。

上面这两个家庭分家,毕竟还是把原来所承担的官府租税进行了分配处理,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数额,而我们所见到一纸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和尚洲蓝、田、水兄弟以及侄儿尚福等的分家合约书中,则明白地记载了这个家庭所应承担的官府大租,已经有五年没有主动交纳了,该合约字略云:“一批明每房该开银拾大圆还何人数项再。一批明早年欠振华数项,若是取讨,该四份均还再。……一批明大路抽出山埔一所,典与家牌、家顿叔全苏仕观,佛银拾大圆,后日若是取赎,照分应得均分再。一批明前五年大租未有经纳,照份均纳再。每年该开大租银 6.375 分(原为苏州数码)。……”这里所注明的“前五年大租未有经纳”,显然是拖欠官府的大租银,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私家的大租谷是不可能由佃耕农户一拖而达五年之久。这个家庭之所以把这项欠银也写进分家文书,并不是为了主动去交纳这份大租银,而是为了预防万一官府前来认真清算,继承财产的子孙们才好有个心理准备。而在实际上,官府的大租已经拖欠五年,再经过这样的分家之后,原来的业主一经去世,四房子孙相互推诿,官府的核查落实就更加困难了。这也是许多清代台湾官吏经常吁叹钱粮不能如额的一个重要因素。



清代台湾的清田问赋难以落实,许多论者都注意到大租户、小租户等一田多主现象的存在和土地物产的不断典卖转移等等因素,然而台湾基层社会特别是家族组织的运作对于官府清田问赋的影响,也是应当引起注意的。上面所引述的民间社会的分家继承等对于官府有效控制和管理田地租税的负面影响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而在另一方面,民间社会家族组织所建立起来的祭祀系统及其公业财产等,同样也在其中起到了阻隔官府与土地业主之间直接产生联系的作用。家族的公业因为是属于众多族人所共有,要在官府的册籍中详细而如实地登记是十分困难的,势不能把所有族人的名字都写进官府的册籍。再者,这些家族的公业田地,经过一代、二代以上的继承、交易、轮值、分割之后,其土地的所有权关系就益加复杂,即使官府欲加以认真清理,也是无从措手,因此,在清代的和尚洲一带,许多家族购置公业田产时,往往另外公议别立一个便以与官府发生联系的名号,政府需要清查登册时,就把这个名号上报应付,日后官府催租征课,也就与这个名号发生联系。我们在前面所引述的芦洲李氏家族在光绪年间起用了“李长利”的名号,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与其他业主发生交易关系和与官府发生登册纳税的关系。光绪年间刘铭传在台湾清理田赋时,给业主颁发丈单执照。这个没有实在人物而只是李氏家族名号的“李长利”,同样堂而皇之地领到了各种应有的丈单和执照。

这种情况不仅仅李长利的这个家族是这样,其他的许多家族也往往有类似的情景,如在和尚洲的另外二支李氏家族,也分别取用了李合发、李合记的名号。关于李合发的情况,我们已经在前面所引用的契约文书中有所反映,兹再引一纸如下:

全立杜卖尽根契字人李怡回,全嗣男珠婴、胞侄梧桐等,有阍分应得四角仔 埔园壹段,址在和尚洲大旗尾庄,东至李合发公业,西至胞弟界,南至标侄竹,北至李合发公业,四界明白,大租钱粮照份均纳。今因乏银费用,愿将此四角仔 埔园尽行出卖,先问至亲人等不欲承受外,托中招引李长利出首承买,全中三面议定值尽根价银壹佰捌拾大圆正,银即日全中交怡回等亲收足讫,园随即踏明界址,交付买主前去起耕掌管收税纳课永为己业。自此一卖千休,四至之内并无留寸土,怡回等及日后子孙不敢言及找赎。保此业系是怡回全珠婴、梧桐等阍分应得物业,与别房人等无干,亦无重张典挂他人及来历不明为碍,如有不明,怡回全花押人等出首抵挡。不干买主之事。此系两愿,各无反悔,口恐无凭,笔乃有据,立杜卖尽根契字壹纸并带合约贰纸、丈单壹纸,共肆纸付执为 。

即日全中亲收过尽根契字内佛银壹佰捌拾大圆完足 。

批明梧桐承叁房半份额,抽出叁分柒厘陆毫与四房。及珠婴承叁房斗份额合卖长尽价银玖元柒角柒点,系五房、六房、柒房公收声明 。

为中人族弟 金枪

场见人胞弟 五胡

光绪拾捌年拾壹月 日

全立杜卖尽根契字人李怡回 嗣男珠婴

胞侄梧桐

这纸契约文书写的虽然是李怡回全嗣男、胞侄等出卖埔园给李长利,但在其所记载的埔园四至界址上,“东至李合发公业,西至胞弟界,南到标侄竹,北至李合发公业”,可以了解到李合发公业的田园不在少数。而李合记的名号,则是李清祥、李长虑等父辈兄弟所起用的,到了李清祥、李长虑这一辈,便把这个名号的财产进行分析管业,该分管合约字是这样的:

全立分管合约字人李清祥、长虑等,缘祥先父与思合夥用李合记名字买李南海等竹围内柑园貳段,历管无异,若不立约分管,恐致后日惹出事端,爰是拈阄为定立约分管。清祥拈得南畔旧宅柑园连厝地壹段,东至李家园,西至竹外陈家园,南至外路,此至李家门口直透厝地壹半,带李南海买李心等印契连司单壹纸。长虑拈得北畔新宅柑园壹段,东至竹外沟,西至竹外陈家园,南至李家,北至李缓竹脚沟,带李合记买李南海等印契连司单壹纸。自分之后,各业各管,不得争竟混管,致伤和气。此系两愿,各无反悔,口恐无凭,笔乃有据,全立分管合约壹式貳纸,各执壹纸永远存。

批明二比 据要用之日取出公看各不得刁难声明。

代书人 李宾其

光绪十三年十一月 日 全立分管合约字人 李清祥

长 虑

用虚无的名号购置公业田产,即使把这个名号登记在官府的册籍中,这个在册的名号也不是真实的田地所有者,若干年之后,其子孙们再把这个虚无名号之下的田地进行分析或典卖之后,官府册籍上的这个虚无的名号愈加显得虚无缥缈了。

清代中期以来和尚洲的土地开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成为台北地区的一个很重要的农作物产地。但是这一时期在官府土地册籍中所反映出来的和尚洲土地业主数额,却与实际情况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清代中期以来历届地方政府力图对台湾各地包括和尚洲在内的土地开垦和耕作情况进行清丈落实,但一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为止,这一系列的清丈土地落实赋税的措施都无法取得如愿的结果,这种情况一方面对于国家政府对于台湾的政治控制和财政管理来讲,当然是很不理想的,也是无可奈何的失控。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清代国家政府不能十分有效地控制台湾基层社会,包括对于户口、田地、赋税的有效控制,对于加速台湾的经济开发和汉人家族社会的形成和拓展,却未免不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正是这种国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台湾经济开发的失控,远涉重洋历尽千辛万苦而来到台湾各地的贫民们,才能在整体租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经过辛勤的劳动,取得了比大陆故乡更好一些的经济收入,从而促进了清代中后期以来台湾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我们在讨论台北芦洲地区开发史的时候,对于清代中期以来这一地区的土地占有关系及其与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联系,无疑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 注释:

高拱乾:《台湾府志》卷7,《风土志》。见《台湾文献丛刊》第65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

陈培桂:《淡水厅志》卷十五(上),附录一,文征(上)。见台湾文献丛刊本第172种,第372~373页。

陈培桂:《淡水厅志》卷四,志三,赋役志。见台湾文献丛刊本第172种,第88页。又参见周钟瑄:《诸罗县志》卷六,赋役志。见台湾文献丛刊本第141种,第87-88页。

陈培桂:《淡水厅志》第四,志三,《赋役志》。见台湾文献丛刊本,第172种,第878页。

见陈培桂:《淡水厅志》第四,第三,《赋役志》。见台湾文献丛刊本第172种,第91~94页。

陈培桂:《淡水厅志》卷四,志三,《赋役志》。见台湾文献丛刊本第172种,第94页。

引自《台湾私法物权编》第二册,第47页,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50种,1963年1月出版。

清末光绪年间芦洲李氏家族在与他人交易土地财产时基本都是用“李长利”名号签订契约文书的,本文所引的契约文书中已有所反映,在此兹不赘引。

作者陈支平: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邮编:361005。